

文人学者

“人參状元”翁同和

翁同和为咸丰时大学士翁心存之子；孙毓汶为大学士孙玉庭之孙，尚书孙瑞珍之子，道光二十四年状元孙毓澂之弟。翁、孙二家，状元、宰相，同列清要；孙毓汶与翁同和又同举进士。孙书法甚妙；翁书法亦甚佳。故是科状元，无第三人敢争，都以为非此二人莫属。

孙家锐意要使毓汶获状头，俾可与毓澂成兄弟状元，乃精心安排。照例，赴殿试的进士家离殿廷稍远的，前一夜可寄宿在朝门附近。孙府近皇城，而翁家较远。是晚，孙家以世谊，邀翁同和来家夜宿。孙瑞珍拉翁攀谈直至深夜，翁倦甚，而孙毓汶则早已就寝。翁将入睡，住房四周爆竹之声大起，彻夜不断，翁终夕不能成眠。天明入朝，已困顿无力。

殿试时，翁因彻夜未眠，执笔无力；正难以支撑时，忽想到卷袋中有人参两枝，急含口中，一时神志奋发，手不停挥，一气呵成。

翁中状元后，方始悟及那一夜乃孙家设计使其困顿无力，欲使孙毓汶中第一。当时遂有人称翁同和为“人參状元”。

甲午日本侵朝时，翁为主战派。是时，他养的两只仙鹤忽丢失。翁亲自写了访鹤招帖。但因他书法极有名，故招帖旋为人揭走，此事轰动京城。有人作诗嘲笑说：

“军书旁午正徬徨，
惟有中堂访鹤忙；
从此熙朝添故事，
风流犹胜半闲堂。”

按半闲堂乃南宋宰相贾似道堂号。贾在金兵渡江时，仍与姬妾在西湖万岭赐第半闲堂内斗蟋蟀。

又有人以联语调侃翁同和、李鸿章二人，联为：

“宰相合肥天下瘦，
司农常熟世间荒。”

盖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；翁同和是江苏常熟人，时任户部尚书、军机大臣兼光绪的师傅。

是时，吴大澂为湖南巡抚，甲午战起，吴大澂请缨杀敌。但他并不知兵，所率军队到朝鲜后，甫一交锋，即临阵溃散。又有人以翁、吴二人合撰一联：

“翁叔平两番访鹤，
吴清卿一味吹牛。”

叔平、清卿为翁吴二人的字。

百日维新失败后，翁同和以曾向光绪保举康有为之故，被革职，永不录用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。翁同和死后，江苏巡抚奏闻，慈禧仅批“知道了”三字。翁临歿时，口占二十字示子侄曰：

“六十年间事，
凄凉到盖棺。
不将两行泪，
轻为汝曹弹。”

其内心之痛苦可知矣。

詹天佑修滦河大桥

长城几乎已成了中华民族的象征，每当笔者看到长城的景象时，总会联想起一个人来。

八达岭长城距京华一百余里，笔者当年曾多次游览，而每次游览，总喜欢从西直门乘火车，一直坐到青龙桥，先去瞻仰一下“詹天佑铜像”。因为詹天佑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，他也像他身后的长城一样，永远屹立在中国人民的心中。

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的丰功伟绩，有口皆碑，是用不着再赘述了。而他修建滦河铁路大桥的一段轶事，同样也是很值得国人自豪的。

光绪十六年（1890年），在沙俄加紧侵略中国领土的形势下，清政府为了保障东北祖坟的安全，采纳了李鸿章的建议，雇用英国人金达为总工程师，修筑关内外铁路。

越两年，工程进展至河北滦河，在宽阔的滦河河面上，要修一座大跨度的铁路桥。金达见有利可图，便聘请英国人喀克斯包工承建。喀克斯不了解滦河地质结构复杂，结果因泥沙深厚，水流湍急，在打桩时遇到很大困难。据《滦县县志》记载：

“修筑桥墩，屡筑屡塌，沿河面宽而流急，河底游沙极深，夏时山水暴涨，势甚强悍，施工最难。”

致使号称具有世界第一流施工技术能力的英国人一筹莫展，不得不求助于日本人和德国人；而日人和德人也依然徒劳

无功，只有望河兴叹。

眼看交工期限迫近，金达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，授意喀克斯，求助当时驻滦河东岸石门、督修从古冶到滦州这段铁路工程的詹天佑，这样便可嫁祸于人，把误期的责任推到中国人身上。他们还封锁技术资料，从各方面对詹天佑进行牵制。

詹天佑报着为中国人争口气的强烈责任感，总结、分析了外国工程师失败的教训，深入现场，与工人一起实地调查，缜密测量，仔细研究滦河河床的地质构造。新桥址选好后，在桥墩施工中他果敢地采用了“压气沉箱法”，这在中国铁路桥梁建筑史上是第一次；同时用中国的“水鬼”（潜水能人）潜入河底，以传统的方法配合必要的机器打桩，顺利地奠定了桥基。《滦县志》叙述当时的情况说：

“雇用谙习水性的机匠，置备下水器具。汲水空根，考验土性的坚凝，用长松木密打花桩，施长方大石和三合土砌之，工程浩大。”

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，这座长 724 米，宽 6.4 米，京山路最长的钢梁骨架铁路大桥，终于屹立在滦河之上。此桥的建成通车，横扫了洋人的骄横之气，为中国人赢得了荣誉。这一年，英国工程研究会特邀詹天佑为该会会员。

伉俪情深梁任公

新会梁启超先生在他的夫人李惠仙女士逝世后不久，曾为文悼念。其中有句：

“风雪蔽天，生人道尽，块然独坐，几不知人间何世！哎！哀乐之感，凡在有情，其谁能免？平日意态兴会淋漓的我，这时也嗒然气尽了。”

悲痛怀念之情跃然纸上。

梁任公一生始则变法维新，继则浮沉宦海，晚年著书讲学。其为政的功过早已多有评品；其文章的议论畅达，感情奔放，亦为海内外同视，堪称一时之创；而他与夫人伉俪情深，尤其为人所称道。

梁夫人李惠仙出身官宦人家，堪称大家闺秀。他们是梁任公在京师会试时结的婚，任公会试落第后，李惠仙随梁回到新会乡间。当时梁家十分清寒，但新夫人不以为贫，奉箕帚，敬老人，与任公同甘共苦，相敬如宾。

戊戌变法失败后，梁任公流亡日本。政治流亡者的生活是动荡的。不久，梁又到檀香山办、理保皇会事。当时，梁任公正是风华正茂、英发有为之年。有一次在檀岛华侨举行的欢迎宴会上，梁发表演讲时，慷慨陈词，议论风生，而为梁担任英语翻译的则是当地的一位华侨小姐何惠珍女士。梁的演讲令闻者动容，而何小姐的翻译也流利畅达，获得阵阵掌声。何小姐正

当妙龄，而且仪态万千。席散后即向任公表示了敬爱之情。

此后，梁离开檀岛到外埠演说时，因缺少翻译，便想起何小姐来。当时，有的英文报纸对任公进行抨击，他因不通英文也无从答辨。正值为难之际，他发现竟有一位作者起而一再为文反驳，梁也不知作者为谁。这时，梁的几位挚友都劝他与何小姐结合。在允许男人纳妾的当时，这本来不足为奇，但是任公以为自己流亡异地，生命毫无保障，与结发夫人尚且天各一方，哪能再连累何小姐。后来，他获悉在报上著文为自己辩护的竟是何惠珍，益增对何的感激与敬慕。他内心无法平静。但是他对李惠仙的情爱是坦诚深挚的，便给远在日本的夫人写信，详述了与何小姐相识的过程。并自白：

“觉得心中时时刻刻有其人，不知何故也。……提笔详记其事，以告我所爱之惠仙，不知惠仙闻此将笑我乎，抑恼我乎？”

他并将何小姐所赠小扇一把寄给夫人代为收藏。理智终于战胜一时汹涌而起的感情。当然，这也是对梁任公与李惠仙情笃恩深的夫妻之情的一次考验，而他们是胜利了。

清 末 三 才 女

清末有所谓“三才女”，即吴芝瑛、徐寄尘与秋瑾。这三人都曾交换过兰谱，以生死相托。秋瑾是其中的佼佼者，所作诗词慷慨悲壮，又喜击剑走马，自号“鉴湖女侠”；后来参加光复会，组织反清起义，不幸事泄被捕，在刑讯中不吐一字，最后凛然就义。另一位吴芝瑛在当时是极享盛誉的女书法家和诗人。她是安徽桐城人，其夫是无锡举人廉泉，曾办文明书局，印行过大批珂罗碑帖书画。吴芝瑛书法工瘦金体，书名冠绝一时，并曾抄录经文、古碑、古诗及自写诗作三十余种行世，其斋署名小万柳堂。

吴芝瑛与秋瑾居北京的故宅都在南半截胡同附近，因而结识。秋瑾与其夫琴瑟不和之后，吴芝瑛即接秋瑾至家暂住。后来吴芝瑛又资助秋瑾东渡日本留学，并赠诗一首：

“ 驹隙光阴，
聚无一载。
风流云散，
天各一方。”

吴芝瑛在北京最煊赫一时的快事当为她上书袁世凯，劝其顺应潮流。后来笔者曾于琉璃厂书肆购过一册吴芝瑛上书的刊印本，名《万柳夫人上容盒先生书》；“容盒”为袁氏之室名。

另一位徐寄尘是浙江石门宿儒杏伯老人之女，为南社社员。

其本名自华，因少年守寡，儿女早殇，孑然一身，故别署“寄尘”。她素承家学，师事南社大诗豪陈巢南，自号忏慧词人，著有《听竹楼诗集》、《忏慧词》、《秋心楼诗词》等。

寄尘与秋瑾结识于南浔女校，一见各相倾倒，日夕纵论家国，遂订兰契。随后与秋瑾赴上海办“中国女报”；吴芝瑛那时也由北京迁家沪上。吴、徐二人在经济上多方资助《中国女报》。报纸停办后，秋瑾回浙江组织起义，寄尘尝与秋瑾密侦杭州城厢内外径道，绘为军用地图。二人谒岳坟时，秋瑾相约如事泄赴义，即请寄尘埋其骨于岳王坟侧。后秋瑾因起义竭于资用，寄尘慨然将家产悉行变卖交与秋瑾。秋瑾大为感动，脱臂上翡翠腕环相赠为纪念。

秋瑾就义后，寄尘冒风雪渡钱塘江，于昏夜秉烛入文种山，将秋瑾遗骨舁至杭州西湖，买岳王坟侧地安葬，又含泪写了碑文。当时吴芝瑛正在病中，闻此大恸，亲撰《秋女侠传》、《记秋女侠遗书》等哀挽诗文，又亲笔撰写了“呜呼鉴湖女侠秋瑾之墓”的墓碑及墓志铭。寄尘后来又与南社同人结秋社和办上海竞雄（秋瑾之号）女校以示继志。寄尘待秋瑾之女璆芝长成，将腕环交与，并撰《还钏记》。当时中学国文课本入选此文，笔者曾朝夕背诵，至今犹能朗朗上口。

张元济临难不惊

浙江海盐张元济先生，早年参加戊戌变法，后来致力于创办商务印书馆，是中国近代维新运动和文化史上有影响的人士。他一生曾两次身历险境，几乎丧生；可是他临难不惊，镇定自若，终于化险为夷。

第一次历险是在 1899 年，张元济参加康有为、谭嗣同、梁启超的变法运动，与康有为一起被光绪帝召见，陈述变革主张。同年九月下旬，慈禧太后软禁了光绪皇帝，戊戌变法失败，康有为、梁启超出逃，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；当时遍捕维新人士，纷纷传说张元济也在缉捕之列。在此危急情况下，张元济仍然每天到衙门上班，并且比平时早到晚退。他自己说是：

“俾知余在署中，可以就近缚送，不必到家查抄，免得惊动老母。”

张元济这种镇定态度，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奇妙的作用，使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顽固派误以为他不是“新党”。最后，张元济死里逃生，只得了一个“革职”的处分。

张元济 86 岁时曾作《追忆戊戌政变杂咏》十八首，其中二首就是叙述上面谈到的这件事情。录之如下：

“东市朝衣胡太酷，
覆巢余卵亦难完；
只应沟壑供填委，
土芥臣原一例看。”

“满朝钩党任株连，
有罪难逃心自安；
分作累囚候明迨，
敢虚晨夕误衙班。”

诗中的填沟壑、作累囚，说明他报着必死之心以后，反而心地坦然了。“东市朝衣胡太酷”，“满朝钩党任株连”，则是谴责了慈禧杀人、捕人的残酷。

第二次历险是在 1927 年 9 月下旬。张元济先生突然被绑票，在匪窟中困居六昼夜。他想读书，但无书可读，更无纸笔。他就默默地“口占十绝”，这十首诗展示了他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不测，处之泰然的胸怀。其中几首幽默风趣，诗意隽永：

“寂寂深宵伴侣多，
篝灯围语意偏和；
微闻怨说衾裯薄，
只为恩情待墨哥。”

（张元济自注：第一夕天气寒甚，守者终宵瑟缩，自言为银钱，故不得尔。按：墨哥，则墨西哥的简称，该国产银，故以“墨哥”指银元。）

“眼加碍碍耳充绵，
视听全收别有天；
悔被聪明多误我，
面墙从此好参禅。”

（自注：守者强余戴黑眼镜，并以绵塞余两耳，解释良久，始允撤去。）

仁者不忧，智者不惑，勇者不惧。张元济先生临难不惊，可谓勇者矣。

李叔同、丰子恺与《护生画集》

李叔同是丰子恺的老师，《护生画集》是丰子恺为庆贺恩师生日而编绘的漫画集，这里面还有一个有趣而感人的故事呢。

1927年的一个清晨，青年佛教学者李圆净居士前往立达学园初次参见了李叔同和丰子恺。第二天，丰子恺拿了两幅戒杀护生漫画回访李圆净征求意见。李一见这两幅漫画，欣喜地对丰子恺说：“子恺兄能画这类作品，在当今之世，实为发扬护生其理无上利器。真该继续绘画一批，以结集济世。”悲天悯人的丰子恺接受了李圆净的恳请。同时想到，二年后李叔同将年届50，如果绘制一批戒杀护生结集出版，正可作为恩师50寿辰之纪念。

丰子恺回到家里，向李叔同谈了他和李圆净的设想，李叔同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题目，并让丰约来李圆净，一起商定了大体规划：一幅图画配上一篇说明文字；丰子恺绘制图画，李叔同撰写说明，出版、印刷、发行等则由李圆净负责。

在此后半年多时间中，或是先由丰子恺将绘就的画幅寄给李叔同，请他审查提出修改意见，并撰写说明文字；或是先由李叔同写出文字，由丰子恺绘制相应的画面。在这一来一往的过程中，李叔同多次致信丰子恺、李圆净。从信中可以看出，他不仅对整个画集的编绘思想反复作了原则性的指示，而且对字之大小、所占地位如何与画面相称相谐，以至用哪种纸张、如

何装订、如何发行等具体细节，也都条分缕析，毫不苟简地予以指点，表现了极其认真负责的精神。

《护生画集》的编绘出版，前后是有变化的。按照初拟计划，原先只收 24 幅图画和说明文字，也并无编绘续集的打算。后李圆净建议，画集出版后可赠送日本有关各界。李叔同觉得此建议很好，但须“再画数十页”。丰、李二人在考虑李叔同的这些意见时，联想到画集当初原为庆祝李师 50 寿辰而作，便进一步建议，将规模扩大到 50 幅。李叔同自是欢喜赞同。

画集于 1929 年 2 月，李叔同 50 寿辰前，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。但这时仍无编绘续集的打算。直到 1939 年，在广西宜山躲避日寇的丰子恺，为了庆贺李叔同 60 寿辰，才有续绘画集的设想。并想以 60 幅庆祝 60 寿辰。这个设想很快得到时在泉州的李叔同赞许与合作。并致信丰子恺说：

“朽人七十岁时，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，共七十幅；八十岁，作第四集，共八十幅；九十岁时，作第五集，共九十幅；百岁，作第六集，共百幅。护生画集功德于此圆满。”

丰子恺复信说：

“世寿所许，定当遵嘱。”

《续护生画集》出版后两年 1942 年，李叔同在泉州圆寂。

胡适、章士钊唱和

胡适虽是 60 多年前之白话主将，但他却是读旧书出身的。他能写旧诗自不奇怪，难的是极力倡导写白话诗。长沙章行严（士钊）办“甲寅杂志”，则拼命反对白话，大骂白话。

1925 年 1 月，有人请客，胡、章二人在前门外廊房头条擗英番菜馆相遇。有人给章照相，章便邀胡合影一幅，之后一人分持一张。章题白话诗送胡道：

你姓胡，我姓章，
你讲什么新文学，
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。
你不攻，我不驳，
双双并座，各有各的心肠。
将来三五十年后，
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。
哈哈，
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，
总算是老章投了降。

章要胡写旧体诗送他，胡便写道：

但开风气不为师，
龚生此言我最喜。

同是曾开风气人，
愿长相亲不相鄙。

反对白话文的盟主写白话诗，白话文主将写仄韵绝句，这倒是奇闻。胡诗第一句引用龚定庵原句，以开风气自任。这两首诗，距今已足足 59 年了。胡死得早一些；弧桐老人章行严则享了将及期颐之寿，活了 94 岁，10 年前才去世，其丧礼可谓备极哀荣。但今日重读以上二诗，的确也使人感到，“好作文学纪念看”，章行严真是言中了。

《甲寅》杂志号称“老虎报”，它一律登文言文，在广告中说：“文学须求雅驯，白话恕不刊布。”章行严 1925 年 9 月发表了《评新文化运动》，10 月又发表了《评新文学运动》，以《甲寅》为阵地，向新文学发起猛攻。一时应战者多人，鲁迅、周作人、徐志摩、高一涵、郁达夫、成仿吾等人都奋起还击。胡适也在京报副刊《国语周报》上，发表了《老章又反叛了》一文，予以还击；文中引了章送他的那首白话诗，因为有“总算是老章投了降”一语，所以题目说“又反叛了”；文中并说《甲寅》广告中不登白话文的话是“悻悻然小丈夫的气度”。

章、胡在文章中争论得十分剧烈，私下饮饌相逢，却还是十分客气的。有一次在上海，汪原放请客人，座上有章行严、胡适、陈独秀。胡当面对章说，章的文章不值一驳，章却也不生气。汪原放十分赞赏章的雅量，这事也给文坛留下谈助。汪原放在近 60 年前，被鲁迅先生误认为是古人，后来鲁迅先生一再在文章中道歉。不想，汪老也真长寿，直到几年前才去世。不过现在确也真成为古人了。

陈独秀 · 苏曼殊 · 《惨世界》

友人借余一册 80 年前出版的书《惨世界》。这是中国清末第一本宣扬民主革命的白话小说，弥足珍贵；但是署名却为“苏子谷、陈由己同译”。

苏子谷、陈由己何许人？现在已不大为人所知。其实，苏子谷即“诗僧”苏曼殊，陈由己即“五四”闯将陈独秀。

陈独秀与苏曼殊相识于 1903 年，时值章士钊在上海主办《国民日报》三人一起共事过从甚密。尤其在学问方面苏曼殊深得陈独秀的帮助；二人又都是民主革命积极的鼓吹者和实际活动者。

1903 年，苏曼殊着手翻译《悲惨世界》，最初以《惨社会》为名，在该年《国民日报》10 月 8 日至 12 月 1 日连载，署“法国大文豪俄著，中国苏子谷译”。后因报社被清政府封闭，第十一回未登完即中止。次年，有个镜今书局，觉得小说未登完很可惜，与陈独秀商量后印行出版了共 14 回的单行本。苏曼殊在译写此书时，得陈独秀的润色加工，故而在单行本印行出版时，署名改为“苏子谷、陈由己同译”；书名亦改作《惨世界》。

《惨世界》名为翻译实为创作用心颇为良苦。全书 14 回，一至六回及第十四回情节系原著所有；七至十三回，完全是两人的杜撰。而这些与原著毫不相关的杜撰文字，却是该书最精